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金融扩张： 对罗伯特·波林的回应^{*}

乔万尼·阿里吉/著 张雪琴 邱昊龙 陈模玲/译^{**}

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在《漫长的 20 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书评中提出了三点出人意料的批评^①。所有三点批评均与我所提出的“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有关。这些周期由两大阶段构成：一是物质扩张阶段,在此阶段利润主要来自购买、生产和销售商品的投资所得(正如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所示);二是金融扩张阶段,在此阶段利润并非^②来自贸易和生产的进一步扩张,而是来自借贷及投机活动(正如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的纯粹形式 $M \rightarrow M'$ 所示)。第一点批评涉及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变机制;第二点批评涉及金融扩张在长期内得以维持的机制;第三点批评涉及构建体系积累周期所使用的方法。本文将逐一进行回应。

* 文章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97 年第 224 期第 154-159 页,英文出处参见:Giovanni Arrighi, *Financial Expansions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Reply to Robert Pollin*, *New Left Review* 1/224, July-August 1997。——中译者注

**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2009),曾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的时代起源》中提出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影响深远,是世界体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另著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等重要著作;张雪琴(通信译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mail: chigagousz@163.com;邱昊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模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译者注

① Robert Poll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gn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1/219, 1997, pp. 109-118;亦可参见:罗伯特·波林著,《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张雪琴、邱昊龙、陈模玲译,《政治经济学季刊》2026 年第 1 期,第 153-163 页。

② 黑体系原文强调内容,后同。——中译者注

引文格式: 乔万尼·阿里吉. 2026.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金融扩张:对罗伯特·波林的回应[J]. 张雪琴,邱昊龙,陈模玲,译. 政治经济学季刊, 5(1):164-169.

Cite this article: Arrighi G. 2026. Financial expansions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reply to Robert Pollin[J]. Zhang X Q, Qiu H L, Chen M L, trans.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1): 164-169. (trans. in Chinese)

据我所知,波林对如下核心论点并无异议:在每一个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向背后,均可追溯到某种体系性的过度积累危机。他甚至赞许地引用了我的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每次物质扩张都是以一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而这种组织结构的生命力又渐渐遭到扩张本身的破坏。”^①但他批评道,我未能一以贯之地聚焦于此,例证便是我对20世纪80年代有关敌意收购的文献视而不见,而此类文献被普遍视为“公司组织形式日益低效”的表现^②。

对此批评,我甚感意外,原因在于《漫长的20世纪》的几乎全部分析事实上都聚焦于体系积累周期所嵌入的组织结构。我同意波林的看法,即我本应处理,或者至少应该提及20世纪80年代有关敌意收购的文献。但是他援引这类文献本身,恰恰暴露出他对何种组织结构同体系积累周期分析最为相关这一问题存在误解。

这些周期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这一体系的规模与范围历经数世纪而不断扩展,但自其肇始之初便囊括了为数众多且形态各异的政府与商业机构。物质扩张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出现了特定的政府-商业机构集团,该集团有能力引领整个体系进行更为广阔或更为深入的分工。这些分工又反过来提升了投入贸易与生产的资本的回报率。在此条件下,利润往往会或多或少例行地重新投入贸易与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并且无论是否有意而为,体系的主要中心都会相互合作,以维系彼此的扩张。然而历时既久,将日益增长的利润量投资于贸易与生产的进一步扩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积累越过盈利性门槛:此时若将这些资本重新投入商品买卖,就必须接受利润率的显著下降。收益递减随之出现,体系内政府和商业机构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剧,由此从物质扩张转向金融扩张的条件便臻于成熟。

在收益从递增转向递减以及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演化过程中,相关组织结构并非体系内各组成单元,而是体系本身。因此,针对波林的批评,《漫长的20世纪》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物质扩张的解释,聚焦于冷战世界秩序的组织结构与矛盾,而非纵向一体化、官僚化管理的公司——这些公司不过是引领世界资本主义完成扩张的政府-商业机构集团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些矛盾中,两大紧密相关的趋势被赋予特殊重要性:一是物质扩张加剧美国公司所面临竞争压力的趋势;二是美国公司倾向于将物质扩张的利润囤积于域外金融市场的趋势。这两大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显露端倪,正是它们触发

①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91页。——中译者注

② Robert Poll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gn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1/219, 1996, pp. 113-114;亦可参见:罗伯特·波林著,《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张雪琴、邱昊龙、陈模玲译,《政治经济学季刊》2026年第1期,第159页。

了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重大转变。相较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敌意收购浪潮则不属于重大转变,而属于金融扩张本身,而这正是波林第二点出人意料的批评之所在,下文将对此予以回应。

金融扩张的利润

波林声称,我从未明确提出关于金融扩张的“最根本问题”,即“倘若利润不是来自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那又从何而来?”他提出这一问题有三种回答方式,且每种回答均指向不同的利润来源。首先,一些资本家以牺牲其他资本家为代价而获利,因而这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利润再分配,而非整个资本家阶级利润总额的增加。其次,整个资产阶级的利润之所以增加,是因为金融交易使资本家要么通过违背曾经对工人群体和社区的既有承诺,要么通过迫使政府向债权人偿还未偿还公共债务而压榨本国民众等方式实现财富与收入再分配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最后,“如果资本家将资金从利润较低的物质生产和交换领域,转移至利润较高领域,金融交易就能持续获利”。波林指出,倘若我能区分金融交易的三种不同利润来源,我本该意识到,在我所描述的模式中,“关键因素”“并非金融交易本身,而是为生产性活动融资找到了新获利模式”^①。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波林在其批评中所罗列的三种利润来源在我关于金融扩张的论述中占据突出地位。波林的第一种利润来源提供了过度积累危机与金融扩张之间的联系。正如我在比较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后所总结的那样,在每次金融扩张的开端,资本过度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组织相互侵入彼此的经营领域;原先界定它们相互合作的分工瓦解了;并且,一个组织的亏损越来越成为另一个组织获利的条件。简言之,竞争由正和游戏转变为零和(甚至负和)游戏。竞争演变为恶性竞争^②。

我同意波林的看法,仅就利润来源本身而言,它并不能为介于每个物质扩张阶段结束到下一阶段开始之间的漫长的金融扩张阶段——通常比半个世纪更长——提供合理的解释。然而,资本主义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包括敌意收购——却巩固了我们所谓的持续金融扩张的“供给”条件。也就是说,通过加

① Robert Poll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gn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1/219, 1996, pp. 115-116; 亦可参见:罗伯特·波林著,《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张雪琴、邱昊龙、陈模玲译,《政治经济学季刊》2026 年第 1 期,第 161 页。

②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227.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93 页。——中译者注

刷贸易与生产领域利润率下降的总体趋势，它强化了资本主义机构将其现金流入中日益扩大的份额以流动性形式持有的倾向。

持续的金融扩张只有在资本主义机构流动性偏好增强且具备相应的“需求”条件时才会真正发生。创造需求条件的“关键因素”是各个国家对流动资本的竞争——这种竞争因过度积累危机而加剧，并导致收入和财富从各类社会群体向资本主义机构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再分配，这正是波林所谓的第二种金融利润来源。我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处推导出的假设贯穿全书，用以解释那些与贸易和生产完全或基本脱节的金融交易为何能持续获利^①。尽管分析聚焦于国家-资本关系而非劳动-资本关系，工人阶级仍被明确纳入在金融资本主义所有“美好时代”中输给资本家的众多社会群体中——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到里根时代，历经热那亚时代、荷兰历史上的假发时代^②及英国爱德华时代^③。

最后，波林提出的第三种金融利润来源——将资本从利润较低的物质生产和交换领域重新配置到利润较高的领域——纳入了分析视野，但这并非作为使金融交易得以持续获利的“关键因素”，而是作为金融扩张被新的物质扩张所扬弃(supercession)的动因。在此，我借鉴了马克思的假设：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信用体系都是将剩余资本从衰落的资本主义贸易和生产组织中心转移至新兴中心的关键工具。如果说韦伯的假设为我提供了关于持续的金融扩张为何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特征的最可信解释，那么马克思的假设则同样可信地解释了这些持续的金融扩张为何最终会导致新的、日益强大的组织中心的崛起，进而领导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物质扩张阶段。

简而言之，《漫长的20世纪》所提出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不仅区分了波林声称我未能辨别的三种不同金融利润来源，而且为每一利润来源在金融扩张的动态机制中赋予了不同作用。第一种来源——资本之间的恶性竞争——创造了寻求在金融交易中进行投资的过剩流动性。第二种来源——收入和财富偏向资本家的大规模再分配——创造了金融交易持续获利的条件。第三种来源——将流动性从那些已丧失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物质扩张能力的组织中心重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p. 11-13, 16, 105, 172, 231, 317, 330.

② 荷兰假发时代系荷兰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大致为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后期，系荷兰黄金时代之后的衰落时期，假发构成了荷兰霸权衰亡期的文化经济符号，阿里吉用以表示荷兰体系积累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同热那亚时代、英国爱德华时代等其他金融扩张“美好时代”一样，资本获利丰厚，社会财富向上再分配，但是普通民众(包括工人阶级)利益受损。——中译者注

③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p. 173-174, 314-315.

新配置到那些正在获得这种能力的组织中心——创造了金融扩张被扬弃的条件。

因此,对波林有关金融扩张“最根本问题”的回答便是:持续性利润主要来源于国家间争夺流动资本所推动的收入和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这使得资本家能够沿着特定发展路径持续获利,即使在维持利润需要——如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所言——“不应再投资于进一步扩张”之后亦然^①。正如波林所坚称的——如图 1 体系积累周期所示——每个金融扩张阶段的特征确实在于新的、成功的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循环的出现。然而,与波林相反,这种新循环的出现并非那个仍占统治地位的 $M \rightarrow M'$ 循环成功的原因。恰恰相反,它正是历史上所有金融扩张终将被新一轮物质扩张阶段所扬弃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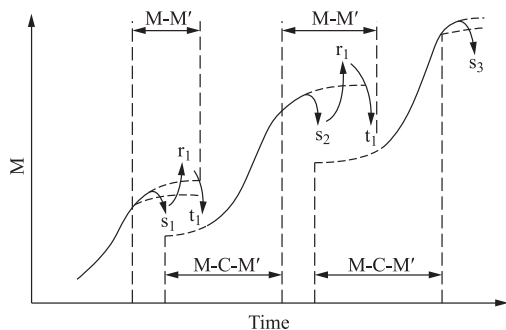


图 1 体系积累周期变形模式^②

最后,波林在方法论上的批评两次出乎我的意料。一是,他提出我试图将有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叙事”维系在“一个相对僵化的分析模型”内,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声称我的方法论“与日益广泛的共识发生冲突,即经济体系的特征是路径依赖——或与之相关的‘复杂性’与‘滞后效应’概念——也就是说,任何特定时期的具体结果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偶然组合方式又为下一轮不确定组合设定了条件”^③。

^① John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69, p. 58 (emphasis added).

^② 该图为阿里吉复信波林时使用的图示,该图同 1994 年英文首版及其 2009 年再版略有差异,在给波林的复信中,阿里吉用 $M-M'$ 代替了上述英文版所使用的动荡(turbulence);用 $M-C-M'$ 代替了上述英文版所使用的稳定增长(stable expansion),参见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367;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2009, p. 242; [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305 页。——中译者注

^③ Robert Poll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gn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1/219, September-October 1996, p. 117;亦可参见:罗伯特·波林著,《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张雪琴、邱昊龙、陈模玲译,《政治经济学季刊》2026 年第 1 期,第 162 页。

路径依赖与演化

两次出乎意料源自如下事实：在实质上而非语言上，路径依赖正是体系积累周期的核心所在。正因如此，我从事实上与理论上构建体系积累周期时采用了高度灵活且开放的方法。金融扩张的发生归根结底源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嵌入的特定发展路径，这使得主导体系的组织中心能够在这些发展路径耗尽其物质扩张潜力后，仍能继续从系统范围的收入再分配中获利。相反，物质扩张则源于：在与这些收入再分配相关的自我维持的世界失序中，涌现出了比金融扩张所依循路径具备更大物质增长潜力的新发展路径，参见图 1。

《漫长的 20 世纪》的大部分叙事旨在说明：诸种新发展路径的出现取决于一系列历史与地理因素并被这些因素彻底塑造，而这些因素本身又被构成金融扩张基础的恶性竞争与权力斗争所转化和重组。然而，该叙事亦旨在表明：数世纪以来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至当前全球规模的新发展路径的**相继更迭**，并非纯粹随机过程。毋宁说，这种更迭是一种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体系积累周期的组织中心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高点上被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结构更繁复的新组织中心所取代。因此，热那亚商业侨民被荷兰早期民族国家及其特许公司所取代，后者又被英国及其正式帝国和遍布全球的非正式商业网络所取代，而这些最终又被大陆级规模（continent-sized）的美国及其众多跨国公司和遍布各地的准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网络所取代。

体系积累周期所描述的演化模式及其反复出现的模式——如果这就是波林在方法论批评中所指涉的对象——并非某种“分析模型”。它们纯属经验建构，其目的不在于解释任何事物，而在于其本身需由《漫长的 20 世纪》中将世界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社会体系所进行的理论重构来解释。这一重构通过对相继更迭的体系积累周期的比较分析，以及通过广泛借鉴那些能够对所观察到的模式提供最可信且最简洁解释的理论建构而逐步推进。正如我在该书绪论与结束语中所强调的，倘若由此得出的分析模型存在问题，那问题恰恰在于它是非决定论的。我丝毫看不出它有何“相对僵化”之处。